

回忆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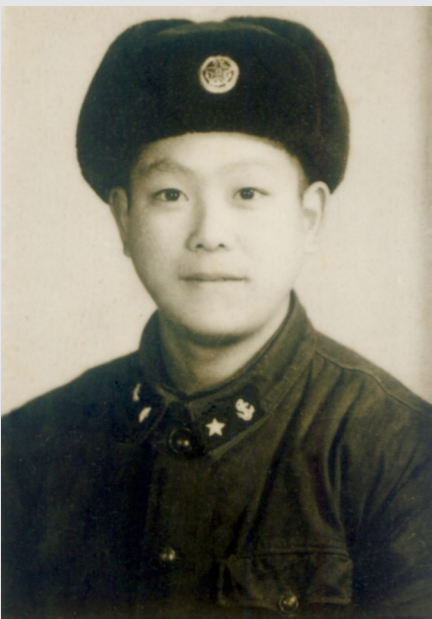
## 老兵故事

# 我为祖国守海疆

■口述:王兆庆(72岁) 整理:李彦 罗晶晶



退休后,王兆庆在市老年大学教摄影、视频制作等课程,平时也经常出去采风。



王兆庆入伍第一年的照片。



王兆庆(左)和战友合影。

(本版照片由王兆庆本人提供)

1964年,不到19岁的我在当时的常德县一中读高三,国防科委来学校征兵,希望招纳一批有文化的技术兵。当时,三年饥荒过去没多久,生活仍然艰苦,为了吃口饱饭,也怀着一腔爱国热情,我报了名,顺利通过征兵体检,成为一名海军特种技术兵。当年9月4日,我离开常德,前往山东。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训练,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某部基地。1968年,我随部队迁往大连,一年后退伍。

### 经过7个月的报务员训练,我每分钟能发出120个以上的字符

入伍培训后,我被分到通讯班,接受7个月的报务员专业训练,也就是使用电台、利用摩尔斯电码收发信息。摩尔斯电码是一些表示数字的点 and 划,由两种基本信号和不同的间隔时间组成不同字符,短促的点信号读“滴”,保持一定时间的长信号读“嗒”,不同的字符分别对应数字1到10。

刚开始速度慢,电键设置的弹簧高度也比较高,老师主要教不同字符的含义,让我们感受长短声的不同。比如,在长码中,一短声一长声表示“1”,两短声一长声表示“2”等,一天只能教3个字符,不然容易混淆。除了课上训练8个小时,课下我们也要仔细琢磨,等记下不同字符的代码后,就要提高训练速度和精确度了。每天晚上睡觉前,躺在床上,我的手就搭在肚子上,练习敲击电键。光会听也不行,还要会写。听电报写数字的时候,要提前准备四五只削好的铅笔,如果一直使用铅笔的一侧写,铅笔头会越写越粗,所以需要一边转动铅笔一边写。这就

要求我们还要练好转动铅笔的手头活儿。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,拿筷子练手。之后,我对电报的调子烂熟于心,到现在仍能信手拈来。

经过长期的训练,速度最快的时候,我1分钟可以接收150个以上的字符,发出120个以上的字符。其实,速度这么快,根本没时间分辨,我们训练出来的是对每个字符时间长度的敏感性,几乎全是下意识的行为。报务员的淘汰率非常高,每年大概有10%的“坏手”被淘汰。所谓“坏手”,就是神经已经无法控制手部操作了。在抗日剧里,敌人想找出报务员,就是看手——中指第一个指关节需要长期压在电键上操作,肯定会磨出茧,这是有根据的。

在部队里,报务员是非常重要的角色,接收上级命令,汇报战区情况,容不得一分一毫有差错。虽然同样的字符要反复操练上千次,但我不觉得枯燥,因为迅速、准确、不间断是做一名报务员的基本准则。

### 我参与了两次岸舰导弹射击实验

当年,苏联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发和试验,我们的基地也是他们帮助设计和建设的。后来,和苏联的关系闹僵,专家全部撤走,我们开始自主研发导弹。

当时,举国上下非常重视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发,毛主席说,哪怕花一万年,我们也要研发出原子弹来。尽管如此,我们的设备和条件与苏联、美国相比,还是有差距的。比如,导弹射击时,需要用摄像机拍下导弹飞行的全部轨迹,我们找来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最好的胶片摄像机,是25帧每秒,但苏联的摄像机可以做到50帧每秒。为了测试发射架周围的温度,我们拉来羊群拴在周围,导弹发射后,羊群也被烤熟了。在导弹试验前,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:发布禁海令、驱散渔船,在实验基地周围布岗,预防敌特分子搞破坏。有一次,我们发现一名特务分子在附近徘徊,可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于是,我们假装搬去海南,没想到这个人也紧跟着去了海南,我们马上抓住了他。

1965年,我参加了两次岸舰导弹射击实验,主要工作是在离岸边不远的军舰上,接收电台指令,通知摄像机进行拍摄。当

时,我戴着耳机,手里拿着铅笔,等待着密码指令。收到指令后,对照密码本翻译出意思。一分钟准备!半分钟准备!开机!导弹腾空而起,摄像机也要同步就位,精神需高度集中。其中一次,我们将一艘退役军舰当做靶船,可一连发射了4枚导弹,都没打中。晚上,我们通过拍摄的画面进行分析,发现是洋流运动导致军舰偏离原定位置。第二天,我们调整发射角度,一击即中。

后来,我调到机务班,学习修理电台,从苏联进口电台,到国产71型、81型、91型电台,每天的工作就是拆装机器,摸透机器的每一个部件。1968年,我随部队迁往大连。在那里,我担任无线电通讯班班长,负责报务员、机务员和教员的工作。1969年,我退役了,之后在当时的农业银行和常德县广播局等单位先后工作,退休后在市老年大学当老师,教摄影、视频制作等课程,至今已有8年。

虽然我当兵的时间不长,但是感触很深。作为军人,我感受到了强烈的使命感、责任感和自豪感。